airiti

政大史粹第 31 期
2017 年 3 月，頁 51-78

徐永昌與抗戰初期華北戰局（1937年7月—9月）

葉銘*

抗戰初期，華北從原定的主戰場變成了策應上海方面的次要戰場，與華北戰局節節失利有很大關聯。這一時期，徐永昌作為代表蔣中正坐鎮華北的石家莊行營主任與華北戰局變換有相當作用。學界過去對於華北初期戰局，比較多關注政略、戰略以及人事情況，不過卻忽略了徐永昌這一重要人物。以徐永昌為線索，梳理其在華北兩月間的舉措，考察徐永昌出任行營主任前後之作為、心緒之變化，發現這些恰恰是華北戰局的投影。徐永昌與華北戰局，反映了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在戰略、內部人事以及備戰方面的作為與不足。因此，華北戰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國民政府戰前政局的縮影。

* 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博士後，講師。

airiti

關鍵詞：徐永昌、華北戰局、抗戰初

airiti

1937年7月14日，正當華北局勢膠著之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電令軍政部長何應欽「準備在石家莊設行營，以次辰（徐永昌）為主任，浩生或哲民為參謀長，何如？」[1]8月14日，蔣中正電何應欽「石家莊行營即改為保定行營，以徐次辰為主任，石家莊設辦事處，由林廳長主持。」[2]所謂行營，乃是軍事委員會委員會為處理特點地域事務設立的組織，其負責人為行營主任，主要職責是「輔佐委員長負責處理行營一切事務」[3]或「代理委員長行使職權」[4]。徐永昌無疑是代表蔣中正處理華北事務的負責人，對抗戰初期華北戰局負相當責任。過去，史學界於此研究不是非常多。目前可以看到比較系統的學術研究主要有蔣永敬的〈從盧溝橋事變到上海撤守〉[5]和賴煒曾的碩士論文〈從地方到中央：論徐永昌與民國（1927-1949）〉[6]。蔣永敬書中，主要根據徐永昌日記中的資料，分析國民政府中主和與主戰派之間的折衝，並通過徐永昌日記的梳理，大致敘述了抗戰初期華北戰局失利的脈絡。賴煒曾先生在其論文第四章第一節中，根據徐永昌日記、閻錫山檔案以及相關史料，更進一步分析了抗戰初期華北戰事失利的原因。兩位或以徐永昌日

1〈蔣委員長致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指示抽調高射炮連與運送子彈到保定並準備在石家莊設行營等手令〉，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作戰時期》，第二編 作戰經過（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44。兩人分別為曹浩森與熊斌。

2〈蔣介石關於在保定設行營等情代電〉，載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 軍事（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743。

3〈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組織大綱〉，周美華編，《國民政府軍事組織史料-軍事委員會（1）》，第一冊（臺北：國史館，1996），173。

4〈參謀本部總務廳第一處抄送重慶等行營組織大綱公函〉，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 軍事（1），42。

5 蔣永敬，〈從盧溝橋事變到上海撤守──據《徐永昌日記》資料〉，收入氏著《抗戰史論》，第四章第二節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277。

6 賴煒曾，〈從地方到中央：論徐永昌與民國（1927-1949）〉（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所碩士論文，2012）。

airiti

記為主要資料，或以徐永昌為研究中心，都有自己獨到的一面。不過，兩位學者共同的問題都在於史實梳理比較清晰，但沒有深入分析背後的原因，對於抗戰初期華北的一些問題解答不夠詳盡。例如，事變前後，國民政府方面原有以華北為抗日主戰場的打算，因為華北戰局不堪收拾，加之處於政略原因最終將主戰場轉移至上海。一般學界認為蔣中正有「引敵南下」之預想，不過，根據現存檔案，國民政府最早在八月三十日才有主戰場轉移的實際部署。當天晚八時何應欽主持的會報中，對於當時形式有這樣描述「……我戰略重點，無形中已轉移於江南。此時北正面只有采守勢作戰，逐次抵抗，與敵持久，以待川、桂軍集中完畢，或滬戰告一結束，方可策劃北正面之攻勢。」[7]為何國民政府會放棄擬議中的北正面主戰場？華北戰局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徐永昌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本文擬以《徐永昌日記》為主要資料，參考相關史料，嘗試作一解答。

一、徐永昌督戰華北原因分析

徐永昌並非蔣中正黃埔建軍的舊班底老人，亦非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蔣中正羅致的原北洋政府的政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徐永昌與蔣中正分處不同陣營。徐永昌是晉系主要人物，晉系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的歷次反蔣運動中曾經扮演重要角色。徐永昌直到1931年代閻錫山掌理山西後與蔣中正才算有了面對面接觸，1937年，徐永昌正式進入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這樣一個資歷很老，但和蔣中正接觸時間很短的人物，在抗戰初期被委以華北重任，蔣中正更是早在7月13日就預定派遣徐永昌位石家莊行營（後來的保定行

7〈何應欽等於盧溝橋事變後籌畫軍事有關會議記錄及附件〉，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 軍事（2），77。

airiti

營）主任了，[8]其原因是多樣的。

首先，徐永昌被派去華北緣於蔣中正對其的信任。「蔣器重徐之才幹與為人，早有將其羅致麾下之意。1935年12月中旬，徐應邀到南京。17日，徐與蔣同車赴湯山東之炮兵學校參加學生畢業典禮。途中，蔣要其出任參謀總長或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答以「優於我者南京實多，自問留我在北方於國家較為有益」，此議遂擱淺。及至蔣聞閻、徐發生齟齬，乃電徐到京任事。一、二兩電被閻扣留。閻接第三次來電後，認為蔣、徐關係已經成熟，留徐無益，乃將蔣電交徐，並將計就計，囑徐在蔣的左右為山西出力。徐於 7月11 日乘車抵南京。16 日，徐與蔣中正同車赴炮兵學校，蔣因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益之）出國考察軍事，要徐接替此職，徐力辭乃已。徐永昌讀了蔣1936年兩廣事變後致李宗仁、白崇禧的信後，認為「委座謀國之忠，待人之誠，藉以大白於天下」[9]，徐永昌對於蔣中正及國民政府的態度可見一斑。西安事變爆發後，徐永昌認為「覺國家前途黑暗已極，憂煩難過。非僅私人感情已也」。[10]除去對蔣的私人感情外，徐永昌認為中國國家前途繫於蔣一身，蔣中正被扣，中國國家前途就變得黑暗，甚至於徐永昌自己都覺得憂煩難過。徐永昌銜命去南京，蔣中正邀徐永昌去奉化見面，徐永昌為西安事變善後出了很多主意。蔣中正十分關照徐永昌，徐永昌對此相當感念，「日來每遇照像，蔣夫人總關照與蔣先生合拍。憶日前下山風大，著甥送圍巾，是皆蔣先生關照者也」。[11]對於徐永昌這樣一個不是很關心

8《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7月13日。

9〈電何部長（應欽）等〉（1936年7月1日），收入陳存恭、趙正楷合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32。

10《徐永昌日記》，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36年12月14日。

11《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2月3日。

airiti

名利的人而言，蔣中正的尊重無疑觸動到了徐永昌的內心，其後蔣中正百般挽留徐永昌留南京任職，最後蔣中正甚至說出「你還能不幫我嗎？」[12]這樣的話，徐永昌最終聽命。蔣中正對徐永昌再三挽留，非常尊重，比較閻錫山在徐永昌任山西省主席時，「省政還是由閻暗中操縱，徐只畫諾而已」。[13]對比閻錫山這種用而又疑的態度，蔣中正使徐永昌頓生「士為知己者死」的想法。1937年2月17日，朱培德逝世。3月初，國民政府任命徐永昌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於8日到職視事，從此正式脫離山西，進入中樞參贊戎機。[14]當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一職可以看作是蔣中正親信才能出任的位置，「辦公廳設立之初，主任權責頗重，可代委員長處理公事」[15]，蔣中正對徐永昌信任可見一斑。

其次，徐永昌與當時華北各主要勢力都有舊交，是各方可以接受的人物。抗戰時期，國軍作戰指揮除去正常指揮系統層級外，還需要靠人際關係維持。尤其日本方面在華北進行多年策動，華北已然近乎獨立的情況下，華北各將領對於國民政府中央心存疑慮也是正常的反應。此時，如果派遣諸如陳誠這樣的將領去華北，勢必會引起華北各將領的猜忌心理，不符合團結華北抗戰之初衷。故而，徐永昌前去華北，不但可以保證軍令上傳下達，也有一定安撫軍心的作用。此時華北主要負責將領有閻錫山、宋哲元，分任山西、河北省主席。

12《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3月3日；趙正楷編述，《徐永昌傳》（臺北：山西文獻社，1989），242。

13 趙政民主編，《中原大戰內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517。

14 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9），《文史月刊》6（2003.6）: 55。

15〈蔣委員長致參謀總長何應欽關於多種整軍方案應擬具實施辦法條示〉（1942 年 10 月 1 日），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蔣委員長中正抗戰方策手稿匯輯》（2）（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108。

airiti

就關係而言，徐永昌與閻錫山關係最近。1926年徐永昌出掌國民第三軍，1927年因反感馮玉祥聯俄舉動，遂帶領國民第三軍投靠閻錫山，並於1931年出任山西省主席。[16]1930年中原大戰之時，山西晉系「在閻周圍的要員中，反對倒蔣的是徐永昌和趙戴文二人」[17]，中原大戰徐永昌負責隴海線一帶作戰，在全軍潰敗之時，徐永昌指揮的軍隊撤退組織最為出色。「所有通過南陽寨地段的部隊，縱屬後衛末兵，均未被截，主要原因，是他指揮之線，工事築的好，力攻必取，守更有餘，未曾吃過敗仗；只是戰略上因友軍不能協調，處於被動而已」。[18]閻錫山決定下野後，「任命徐永昌和楊愛源分任晉綏警備總、副司令，由徐負兩省總責」。[19]此時徐永昌與國民政府中央方有直接接觸，被蔣中正派去西北整編善後的陳誠向蔣中正彙報時評價徐永昌「沉厚緘默，處事穩妥，其原有勢力，為前國民第三軍孫嶽舊部。任河北省主席時，雖經閻幾度分割，然其部隊，存有歷史性，精神上尚能團聚。較商（震）力量稍強」。[20]其後不久，閻錫山回晉，徐永昌「不再想有所作為，事實上也不能有所作為。省政還是由閻暗中操縱，徐只畫諾而已」。[21]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中正開始整合中國各派勢力。對閻錫山，蔣中正是不放心的，徐永昌此時去見蔣為閻說項。「徐永昌在武漢和石家莊兩次向蔣中正表示全力支持閻錫山主持晉綏軍政，在閻錫山東山再起並能繼續存在下去這

16 參見王成斌等主編，〈徐永昌〉，《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 1 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趙正楷編述，《徐永昌傳》相關記載。

17 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5），《文史月刊》2（2003.2）: 64。

18 趙正楷編述，《徐永昌傳》，190。

19 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6），《文史月刊》3（2003.3）: 57。

20 陳誠，〈報告總司令蔣西北概況及聯絡辦法〉（1931 年 6 月 25 日），收入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296；其時，因為「閻錫山部隊由徐永昌指揮，終能全師而退，從而使蔣先生認識了徐永昌是一位將才」，參見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102。

21 趙政民主編，《中原大戰內幕》， 517。

airiti

個關鍵問題上，起了重要的作用」。[22]儘管1936年，在堵截徐海東部紅軍問題上，徐永昌與閻錫山發生面對面的爭執，[23]徐永昌與閻錫山自此無法合作共事。但是，徐永昌與閻錫山關係並未鬧僵，雙方依舊有密切聯繫，山西方面與國民政府中央之間連絡人就是徐永昌。徐永昌與宋哲元亦有相當的關係，1935年張北事件後，日方逼迫宋哲元辭去察哈爾省主席，國民政府行政院迫於日方壓力，免去宋哲元職務，宋哲元對此非常痛恨。徐永昌過去就愛宋之才，稱之為「好漢」。此事後則通過秦德純、蕭振瀛等勸慰宋哲元，徐永昌特別指出日本人對宋哲元的舉措是為了讓宋哲元出頭，實現其華北五省特殊化之陰謀，勸說宋哲元「自治出現不得了，明軒（宋哲元字）不消極不得了」，堅定了宋哲元不投身日方的信心。[24]「七七事變」後，徐永昌於1937年7月23日致函宋哲元，希望宋哲元與中央軍有切實聯繫，以備日軍可能進攻。[25]

第三，徐永昌比較熟悉華北局勢。徐永昌早年投身毅軍，其駐軍地點就在琉璃河。其後，他考入陸大，深造地點在北京。1917年，徐永昌出任孫嶽主持的直隸軍官教育團教官，教育團駐在廊坊。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爆發，徐永昌所部在良鄉附近與奉軍交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徐永昌出任國民第三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駐防保定，負責平漢線北段治安。北伐軍興，徐永昌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路軍總指揮，率部攻克保定。1929年，徐永昌出任河北省

22 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8），《文史月刊》5（2003.5）: 62。

23「閻先生對共党問題之嚴重，說的如矛之無堅不摧（餘以為未必，且亦不必如此講），說到土地（村）公有、防共保衛團等，又如盾之無銳不挫。余說話嫌激，閻先生亦氣盛。悔甚，悔甚」，《徐永昌日記》，第三冊，1936 年 2 月 5 日。

24 此事參見趙正楷編述，《徐永昌傳》，221-228。

25 參見〈函宋委員長（哲元）〉，收入趙正楷、陳存恭合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50-51。

airiti

主席。中原大戰開始，徐永昌出任隴海路總指揮。[26]徐永昌出身華北軍旅，其早年生涯幾乎都在華北地區度過，並出任過河北、綏遠、山西等華北省份主席，於華北兵要地理相當熟悉。「七七事變」爆發後，作為軍委會辦公廳主任的徐永昌，接受蔣中正的指令並與華北將領聯繫，對於華北局勢發展有相當的認識。事變發生第二天，蔣中正即電令徐永昌「應即準備向華北增援，以防事態擴大為要」[27]。同一天，蔣中正指示徐永昌「隴海路開封以東部隊，可暫緩開動。由開封以西部隊中先派一師，開赴黃河以北，其餘準備兩師，可隨時出動為要」[28]。晚間，徐永昌在軍事委員會參加相關會議。[29]其後諸如孫連仲、龐炳勳、高桂滋等部北調，[30]以及盧溝橋周邊及華北局勢演變，徐永昌均有瞭解，並親身參與運籌帷幄。對於日方情形，徐永昌也頗為關注。在其日記中有「聞日之第五第十兩師團已在準備上船。又朝鮮之第二十師團亦向我開動。天津日僑義勇軍已發給槍械」[31]、「截至十五日，到津之日兵車已達二十列（路局息）。又日本本國已動員第五、六、十、十二、十六等五個師團來華（外部息）」[32]。直到徐永昌動身去華北之前，他對於華北敵情我情掌握頗多，亦親自參加華北兵員調配。

有鑒於以上三點原因，由徐永昌代替蔣中正監督華北軍事指揮

26 參見王成斌等主編，〈徐永昌〉，《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 1 集，438-445 相關記載。

27 〈蔣委員長令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轉示參謀總長程潛準備增援華北電〉，《盧溝橋事變史料》（上冊），收入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 106 輯 （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6），210。

28〈蔣委員長致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參謀總長程潛指示部隊調動電〉，《盧溝橋事變史料》（上冊），211。

29《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8日。

30《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9日。

31《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2日。

32《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6日。

airiti

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恰當的選擇，理論上應該發揮相當作用。

二、華北戰局概況（1937年7月—9月）

所謂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華北， 廣義上包括河北、察哈爾、山西、山東、綏遠、北平、天津等五省兩市，狹義而言就是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兩省兩市。華北戰局指的就是抗戰初期，在這一地帶發生的戰事情況。

首先，華北的「特殊化」造成抗戰初期華北備戰不力。關於華北「特殊化」，研究論文較多，在此不一一贅述。大體而言，學界認為自從1933年《塘沽協定》開始，日軍對華北的企圖就是通過種種壓力，削弱國民政府在華北的統治基礎，進而促使地方軍閥建立親日政權，其路徑則是利用「河北事件」與「張北事件」達成「驅逐南京勢力」的目的，並發起所謂的自治運動，最終實現其野心[33]。冀察當局主要負責人宋哲元儘管沒有如日本人所願公開組織親日政權，但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實現了日本方面控制冀察的目的。另一方面，由於國民政府的中央軍、國民黨黨部等中央系統被迫撤出華北地區，南京國民政府對華北的控制力減弱，宋哲元等與南京國民政府貌合神離的態勢漸漸加強。對於備戰，冀察當局並不積極，一方面擔心其半獨立態勢被打破，另一方面則對與日本開戰沒有信心，害怕失去對於華北的控制，從而失去兵員糧餉來源。特別是根據《塘沽協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甯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

33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324-325；劉鳳翰，〈抗戰前的序幕戰〉，收入氏著《抗日戰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77-84；李雲漢，《盧溝橋事變》（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24-33。

airiti

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34]日軍可以利用冀東與關外取得軍事調動之便利，而中國方面對於日軍在這些地區的軍事活動無能為力。因此，戰前的華北，日本方面佔據天時地利，中國方面則處處被動，備戰上先輸一籌。

其次，華北地方當局患得患失造成抗戰初期中國方面進退失據。由於冀察方面對於華北自治態度曖昧，早在1937年5月，蔣中正在日記中就寫道：「三、預防冀察之獨立。四、消除各省軍閥與雜軍之野心，使之誠心服從方略。」[35]同月蔣在日記中再次寫道：「四、冀宋以中央放棄華北之口號，應嚴斥其妄。五、對宋態度應嚴而正，指示其出路。六、宋要中央宣傳對華北之接濟與關切之意。」[36]由此可見，蔣中正對於冀察當局的動態一清二楚，對於他們的態度也是軟硬兼施，重點就是防止冀察當局脫離國民政府中央的管轄。經過一番斡旋，冀察方面似乎與國民政府中央達成某種諒解，蔣中正在日記中記道：「一、補充冀宋高射炮；二、冀察作戰準備。」[37]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中正「積極運兵北進備戰」。[38]在這周反省錄中，蔣中正這樣寫道：「倭寇於八日在蘆溝橋挑釁，與我守軍對戰，其意在非奪取蘆溝橋不休，至今猶未告段落。此為存亡關頭，萬不使失守也。動員六師北運增援，如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則不能和平解決也。」[39]蔣中正抗戰決心可見一斑。「七七事變」爆發當天

34〈代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等報告日方提出停戰條件四項情形呈中央當局電〉，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作戰時期》，緒編（1）（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644。

35《蔣介石日記》，1937年5月2日。

36《蔣介石日記》，1937年5月12日。

37《蔣介石日記》，1937年6月13日。

38《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9日。

39《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10日。

airiti

中午，徐永昌與人閒談「如此國家，尚侈言抗日，直以羊猜虎耳。」[40]當國民政府中央開始討論華北局勢時，此時徐永昌根據自己的觀感，認為「此間（南京）亦似盼望和平，尤盼能和平至六個月後（此為最小限度，因彼時各要塞新炮大部可以裝成）。但對於明軒之表示，卻又嫌其不蠻狠（明軒發表之書面談話，餘以為大體上很不錯，敬之不以為然）。明軒不之保（定）而留津，必在謀和平也。此可以測明軒，可以測時局」。[41]認為「對於佈置自當積極，對於和平亦不可置之度外，須與明軒協調進行。否則明軒孤行己意，於大局前途殊不利也。」[42]蔣中正認為「一、對蘆案英美已有合作調解趨勢；二、宋住津態度不定，可知其果為倭寇軟化，受其欺乎；三、北進部隊之行動應立于進退自如之餘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則中央部隊決不南調。」[43]表示中央決心。可是，不久「熊哲民電話雲明軒詢問三事：一、孫連仲部隊競占民房；二、聞第十師要到保定；三、中央將有指揮官來河北。哲民徑答以並無二、三兩事（第十師現駐彰德）。此餘曩日所謂，他要夠一個國家，他就顧他的國家」。[44]宋哲元對國民政府中央隔閡較大，想自己與日方談判，消弭兵事，保持自己在華北的地位。徐永昌也認為「以我國國防論，能再忍半年實較有利；惟日本軍人或不容許，而中國自身亦不允許，奈何？」[45]華北冀察當局內部對和戰也有爭論，不過最終還是與日本方面簽訂約定，這幾乎是之前華北歷次中日約定的翻版。如此約定，麻痹自己，擾亂軍心，原因就是內部戰略不定，徘徊於和戰之間。不但在前線的冀察

40《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7日。
41《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2日。
42《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4日。
43《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14日。
44《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6日。
45《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4日。

airiti

當局，在南京的國民政府亦有之。徐永昌認為「對於佈置（作戰），自當積極；對於和平，亦不可置之度外，且須與明軒協調進行。否則明軒孤行己意，於大局前途殊不利也。」[46]針對外界對宋哲元的疑慮與批評，徐永昌為之同情，「舉國皆注意怕宋屈服於日勢下，其他皆不甚措意，真是怪事！這也是宋的本領，也是宋的可憐」。[47]當蔣中正發表廬山談話之後，徐永昌直接面見蔣中正「餘論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48]可是時局發展很快，「明軒電話告哲民云戰事恐難避免，請準備第二步云云。並已派張維藩到保商作戰方式等」。[49]直到此時，宋哲元方願意與中央合作抗戰。然而，由於之前的種種遲疑，加之宋哲元對日方一面交涉一面增兵缺乏必要的警覺，以至於日軍發動突然襲擊，華北重鎮平津兩日內即告失守。蔣中正在日記中記道：「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時，倭向廊房卅八師攻擊，今申又在北平廣安門對戰。倭必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而宋始終不悟，猶以為可對倭退讓苟安，而反對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隊撤退，可痛也乎。」[50]

最後，華北中國各軍在戰場上節節失利，喪失主動。抗戰爆發之初，華北的冀察方面有國軍第29軍，下轄37、38、132、143師，騎兵第9師，獨立第39旅、第40旅、獨立騎兵第13旅、特務旅和河北省保安隊，共計24個旅的部隊，總數10萬人左右。其後，中央增援各部第3、13、17、32、52、67各軍和第27路軍加入作戰，總兵力不下25萬人。[51]日軍原駐紮在北京附近的是支那駐屯軍，大約一個旅團

46《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4日。
47《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7日。
48《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20日。
49《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8日。
50《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6日。
51 劉鳳翰，〈陸軍與初期抗戰〉，收入氏著《抗日戰史論集》，196-215相關資料。

airiti

兵力，其後先後加入獨立混成第1、2、11旅團，第20師團，第5、6、10師團。關東軍則組織混成第15旅團進軍察哈爾。隨著戰事的擴大，日本方面又增派第14、16、101、108、109師團進入華北。華北方面日軍編成華北方面軍，下轄第1軍和第2軍，共計8個師團1個混成旅團以及附屬的特種部隊，總計兵力在20萬人左右。[52]華北地區，國軍兵力從局部優勢到勢均力敵，考慮到技術兵種和戰鬥力的差別，國軍在華北的作戰表現自然也就差強人意了。在平津方面，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雙方談談打打。7月25日發生廣安門事件，26日日軍進攻廊坊，29日駐紮在北平的29軍撤出北平城，北平失陷，30日日軍進佔塘沽，天津失陷。[53]平津失陷後，國民政府頒布了《國軍作戰指導計畫》，就是大家習慣稱為的「八二〇作戰指導」，這是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的主要作戰計畫。該計畫規定第一戰區（河北、山東）「對北正面（平津）為制限敵軍之自由轉移兵力于平綏線，及使我第二戰區在平綏線方面作戰之便利起見，應即派有力之一部（約兩軍），近迫當面之敵，實行柔性之攻擊，同時抽調在平漢線北端部隊（機動性大而富於遊擊戰之經驗者）約三師（能多更好），歸第二戰區長官指揮，向懷來、萬全之線以北轉進」；第二戰區「第一步，以該戰區現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須固守南口、萬全之線，以俟第一戰區轉移兵力之到達。第二步，第一戰區轉移兵力到達後，向赤城、沽源之線轉移攻勢。第三步，依戰況之推移，對於山西東北方面，厚積兵力，以期永久固守。」[54]根據這一方案，華北國軍必須固

52 參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 1 卷第 1 分冊、第 2 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相關資料。

53〈華北作戰經過概要〉，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作戰時期》，第二編 作戰經過（2），137-138。

54〈國軍作戰指導計畫〉，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41。

airiti

守南口，防止日軍從平綏線攻擊國軍第二戰區，同時控制平漢線和津浦線北段，與日軍進行決戰。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平綏線方面，日軍攻勢猛烈，國軍雖然浴血奮戰，卻在8月26日棄守南口。平漢線與津浦線北段，儘管中國方面預設有國防工事，但因為華北政局複雜，並未能完成。9月18日，琉璃河、房山一線陣地被日軍突破。9月21日，石家莊行營撤銷，將平漢線北段和津浦線北段分別劃為第一和第六戰區。至此，華北初期抗戰遂告結束，[55]華北大片國土淪入敵手。因此，華北也從擬議中的主戰場變為次戰場，上海則成為這一時段抗戰的主戰場。

三、徐永昌督戰華北作用與效果

儘管徐永昌督戰華北可謂「人地相宜」，但是最終華北戰局卻差強人意。華北也從主戰場變成了策應戰場。客觀說來，徐永昌對於華北戰局還是起到自己應有的作用。徐永昌雖然並不贊同在當時與日本政府全面開戰，不過他忠於職守，參與華北戰場方略擬定，代替蔣中正進行協調，同時實施戰地作戰指揮。

徐永昌參與華北戰場作戰方略的擬定，並發揮相當的作用。1937年3月，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所擬《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中，華北方面判斷日軍主攻方向是經北平-天津，沿平漢-津浦兩路，向鄭州-濟南-徐州進軍，以期殲滅中國軍主力。副作戰由多倫經張家口－綏遠－河套－大同，及由北平經保定、石家莊，向太原前進，取包圍山西之勢。[56]在作戰指導方面將主力置於滄州-河間-保定一

55〈華北作戰經過概要〉， 138-142。
56〈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1），593。

airiti

線，重點在平漢線，與平津間日軍進行決戰。如果無法保持滄保線，則主力使用於德州－束鹿－石家莊一線，重點仍在平漢線，與日軍會戰。如果會戰失利，則向黃河下游河南境內即設陣地進行逐次抵抗，行持久戰。[57]

按照戰前預案，「七七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迅速抽調孫連仲、商震等部集結石家莊一線。7月20日，蔣中正自廬山回南京，召開包括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在內的軍事會議。會上，各將領提出許多計畫設想，莫衷一是。[58]7月23日，徐永昌擬就一函給蔣中正，全面闡述自己對華北戰事的看法，「我為軍事上之進一步與宋聯繫，似宜派兵進佔由盧溝橋沿永定河經固安至霸縣一帶之斜陣地，以保持平漢路常通，而不使平津之二十九軍陷於孤立。假定日人一面與宋妥協，一面實行壓迫中央軍，在此種情況下，我應拒之滄保線上，平津之二十九軍可一任明軒之自由獨斷，彼願加入，即用盧霸斜陣地，如彼不加入，或者更好……此時於德州似應集結有力之兵，使第三路全部固膠東，以第三路全力務有不許日軍隨意登陸之設施。假定我軍早早退守濰河線，日軍占濰河以東即不退，適中其不戰占地之策，迨其占膠東後，遇有調停，豈不吃虧，以膠東完善之區，不比河北也。」[59]同日，徐永昌給宋哲元函電中闡述相似的意思[60]，尋求宋哲元與中央之合作抗日。平津失陷後，徐永昌致電蔣中正「我之對策，當然在鞏固察綏，鞏固滄保等線，惟已鞏固之

57〈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1），597。

58《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20日。

59〈上蔣委員長〉，收入趙正楷、陳存恭合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48-49，此也是徐永昌 21 日軍事會議上主張內容。

60〈函宋委員長（哲元）〉，收入趙正楷、陳存恭合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50-51。

airiti

後，即應鞏固琉璃河馬廠之線，平津在我監視之下，我急進緩進皆得自由，敵占平津，無異自重其困難……如能推演成局部的持久戰，實較整個開戰為有利也」[61]。故而，大本營在擬定作戰指導時，對於華北（第一戰區）基本採納徐永昌的建議，軍隊部署注重所謂柔性攻擊，並重點注意日軍對津浦線、平漢線可能的進攻，以及對山西的迂回。山東方面，縮小青島圍攻線，使敵軍爾後展布困難。[62]

徐永昌協調華北各派系將領關係，力圖維持合作抗戰局面。他與閻錫山有密切聯繫，瞭解晉綏戰況，以使整個華北戰線連成一線。[63]對於宋哲元，徐永昌儘管有「他要夠一個國家，他就顧他的國家」[64]這樣的批評，但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盡力回護。認為外交交涉「須與明軒協調進行。否則明軒孤行己意，於大局前途殊不利也。」[65]當得知宋哲元與日方有妥協約定之時，「嶽軍（張群）……應詢明軒究竟有無其事，餘主不詢。蔣先生當複明軒一電，大意略謂和戰中央與地方一致，所有條件中央如認可請批示，中央當為負責。惟第三條不要再與訂有細則以免自範行動。」[66]儘管宋哲元在這一段表現不免讓人有所懷疑，不過徐永昌代為緩頰無異讓宋哲元感覺中央對其溫和態度，堅定其抗日決心。當時華北各軍系統龐雜，軍心士氣都受戰事影響。徐永昌一再協調勖勉，與將領談話頗多且態度至誠，推心置腹。孫連仲頗受感動，與之關係甚深，所部表現也不錯。[67]即使

61〈電蔣委員長〉，收入趙正楷、陳存恭合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51，電函原稿上有「主力軍不可動太多」條陳字樣。

62 參見〈大本營頒國軍戰爭指導方案〉，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 軍事（1），624；〈國民政府大本營頒第一戰區作戰指導計畫訓令〉，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 軍事（1），614-615。

63 賴煒曾，〈從地方到中央：論徐永昌與民國（1927-1949）〉，69。

64《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6日。

65《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4日。

66《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23日。

67 參見趙正楷編述，《徐永昌傳》，247。

airiti

碰到一些挾兵自重者，他也盡力去安撫。馮治安曾經威脅辭去河北省主席一職，「蓋以第二師接保定城防，遂疑中央別有用意，當極力解釋，大敵當前，勿緣小故彼此誤會。」[68]

不過華北方面派系林立，局勢複雜，派系問題可謂華北初期抗戰失利的重要原因，徐永昌後來檢討戰事時曾認為「我軍失敗原因在內外不一，即內心消極表面積極（用兵時已留後手，又不肯白白吃虧）。先不舍地而派兵，後不降志而增兵，為地派兵，非為戰派兵，結果地兵兩失。」[69]誠哉斯言！

1937年10月12日，徐永昌離開華北回南京接任第一部部長，徐永昌當天在日記裡這樣描寫自己的心情「兩旬來之苦惱，今日乃脫離。」[70]是什麼讓徐永昌如此苦惱呢？就是他在華北所遭遇的派系紛爭。《何梅協定》之後，國民政府勢力，包括國民黨黨部、中央軍等相關機構退出華北，華北「特殊化」了。原西北軍系控制了華北，他們與國民政府中央之間關係微妙。他們既擔心日本人侵奪華北，也擔心國民政府中央插手，奪取他們的地盤。「七七事變」爆發後，冀察當局一再想與日方妥協，並婉拒中央軍北上。平津淪陷後，徐永昌曾經評價「冀察先不要中央軍來，後嫌來的慢。先不要中央在冀南做工事，自己在平津也不做工」[71]，表達地方派系只顧自己團體利益的不滿。

由於平津失陷，察哈爾三面受敵，於是國民政府準備派軍入察協助作戰。但是徐永昌「聞湯恩伯軍入察，劉子亮（劉汝明）頗不

68《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8月11日。
69《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9月26日。
70《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10月12日。
71《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30日。

airiti

同意，蔣先生強之方得行」。[72]劉汝明自己回憶其對湯恩伯率軍入察表示歡迎，[73]但事實上，徐永昌卻有這樣的議論，「餘以為劉非不抗日者，劉既不願湯入察，盡可任之。彼有法緩敵更好，否則待其急而救之豈不有力」，且說「中央軍援地方是兩個當兩個用，中央軍待地方軍援是兩個當一個用。」[74]大敵當前，尚有如此畛域之分，豈能不敗！

8月9日，蔣中正命令由第二師接保定防務，第二天再次命令。可是馮治安卻要辭去河北省主席一職，「蓋以第二師接保定城防，遂疑中央別有用意，當極力解釋，大敵當前，勿緣小故彼此誤會」。[75]地方不顧大局如此，雖有徐永昌極力解釋轉圜，但是「馮仰之不願關陳軍隊到此區域，請將關陳調開，願由二十九軍擔任，今關陳已調開矣」，徐永昌感歎「好私取巧如此，吾為若惜之」[76]，「懼日又不能不抗日，疑中央又不能不賴中央。今日中國之擁有重兵者，無不然也，危哉。」[77]華北戰局日趨緊張，但是指揮方面卻沒有好辦法。徐永昌認為「隊伍太雜，能戰者甚少」，「指揮太不統一，決不能多維持時日」。[78]非但地方軍如此，中央軍亦然。徐永昌評論「重要將領批評雜牌隊伍如何不能打仗，如何軍紀不好，如何潰不成軍。實際上調整師亦間有之。其不批評調整師者，一則因其與委員長接近，一則可以委過於人也。」[79]

72《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31日。
73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2014），196。
74《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8月6日。另參見〈徐永昌等關於平綏東段及平漢北段作戰情況與軍委會來往電文〉（1937年7月－9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787/7235。
75《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8月11日。
76《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8月12日。
77《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8月11日。
78《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9月22日。
79《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9月24日。

airiti

雖然徐永昌盡力協調華北各派系軍人之間關係，無奈派系問題深入國軍骨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徐永昌也只能緩解局面而已。

徐永昌居中上情下達，指揮監督華北初期戰事。七月底平津失陷後，宋哲元派秦德純等往見徐永昌，告知二十九軍平津作戰情況以及各部位置。當天徐永昌即將所得情況編寫整理，連發三封電報給蔣中正，重點在於條陳建議「仍宜付明軒以重責，使之整頓，一星期後猶可應戰」,「明軒一再聲述，不能負平漢、津浦全線指揮之任，但其名義，似又不宜過低，職意或令其指揮平漢至任邱一段，津浦方面則派一與其資望相當之人負責，或委一總指揮隸經扶或向方之下，全其顏面，或令啟予前往指揮」。並提出「平漢鐵路正面僅琉璃河有孫部一旅，刻令酌派少數部隊到良鄉警戒，並以鐵甲車一列屬其指揮」,「滄、保工事，暫令萬、孫、龐各部加工趕築，冀早完成。」[80]蔣中正大致採納了徐永昌的建議，任命宋哲元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所部雖然戰績不佳，但也為華北初期抗戰做出貢獻，至於滄州、保定一線，其工事為國軍防守提供一定的保障，可謂徐永昌之功績。

9月上旬，馬廠棄守。徐永昌「決於昨晚反攻馬廠，龐更陳先電彼如何在姚官屯陣地線佈防。旋即電中樞請增援。蔣先生令行營酌辦云云。亦可見津浦軍心矣！在餘想像，敵攻下馬廠必切實佈置，爾後偵查我守備情形，俟有瑕可乘方進，決不冒昧窮進。乃我軍反自惶惶」[81]。徐永昌當天發電給蔣中正「永昌默察敵我情勢，覺我第一戰區將來仍必有一度或再度之後撤」，原因有「敵長於大陸兵器，

80《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 年 7 月 30 日；〈徐永昌等報告宋哲元部平津作戰敗退情形並提出對付辦法密電稿〉，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1），127-129。

81《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9月13日。

airiti

遠非我之所及」，「此時敵在北方，完全居於有利之內線作戰」，「敵人用力能一致，我則不免紛歧」。所以提出「平地戰線之層復工事，須再加強」，「努力引敵入山地戰，使其利器不得施展」，「必不得已時，為有計劃的後撤，俾敵失去內線作戰之利」。「第一戰區，平原千里，敵之利器施展，較任何戰區為最優，我之情形複雜，亦較任何戰區為最甚，必進退有預定計畫，方不至有一潰莫救之虞」。並提出「德滄間須駐精整得力之部，擇築永久工事，既可作前方聲援，設有不虞，亦可督截收容，不至一潰莫救」，「德州重地，尤應有威望大員坐鎮」。[82]其後，蔣中正採納其建議。

不過徐永昌在華北也面臨職責不明、事權不一的問題。1937年7月14日，蔣中正給何應欽打電報準備在石家莊設立行營，並以徐永昌為行營主任，徐永昌的態度卻不是很願意接這個職位。「蔣先生電，擬在石莊設行營，請余任主任，曹（浩森）、熊（斌）兩次長擇一任參謀長，餘謂稍嫌早。按此實較佈置軍隊之刺激性大也。」[83]這是因為徐永昌顧忌華北複雜局面，不想刺激冀察與29軍方面。蔣中正從廬山回到南京後，7月23日軍委會會議中，「關於石莊行營，即行籌備。餘力辭該處職任，當決定先派要員前往主持。」[84]於是，讓林蔚先行前往石家莊進行折衝。四天後，「蔣先生約談，仍組石莊行營。余偕熊哲民先往保定……餘堅持不要名義，只往保定協商明軒相機處理一切。」[85]也就是徐永昌人去保定，但只是甘於居幕僚身份，或者是顧問身份，而不負實際責任。第二天，「餘再辭行營主任名義

82〈上蔣委員長〉，收入趙正楷、陳存恭合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53-54。
83《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14日。
84《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23日。
85《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27日。

airiti

（得許可先令林蔚文組織，暫不發表）。」[86]就徐永昌個人而言，這樣一再請辭行營主任多半與其淡泊名利的性格有關，與他對華北局勢複雜性認識相關，也與他對此時與日本人全面開戰有不同看法有一定關聯。然而，不管出於何種動機，他的謙讓請辭卻帶來了不利的後果。八月初，西安、廣州、重慶等地行營發表，斯時酣戰正急的華北前線，石家莊行營卻沒有正式發表，華北前線無形中就沒有了指揮中心。徐永昌有行營主任之名，但卻不負實際作戰指揮之責。根據蔣中正發給徐永昌的電報可以看出，徐永昌的行營基本就是轉發蔣中正的指示，作戰中實際指揮的職責發揮有限。[87]其後，華北先後由第一、第二兩個集團軍，第一、第二戰區成立。尤其是戰區成立，行營身份就顯得十分尷尬了。九月下旬，參謀總長程潛前往石家莊指揮第一、二兩個戰區，行營的地位就更加無足輕重了。戰時國民政府在組織上習慣於疊床架屋，造成事權不一，後果是嚴重的。以至於蔣中正自己曾經下過命令「希即轉達各軍，務遵照指揮系統下達命令，勿得逾越為要。」[88]徐永昌自己感歎「在此固無著力點處，即有之，亦為瑣務所累」，「無參謀長代看」。[89]公平說來，這種尷尬地位始作俑者就是徐永昌自己。如果徐永昌自己當時勇於擔責，明確接手，華北何至於出現機構職責不明，事權不一的情況呢？

86《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7月28日

87 有意思的是錢大鈞在其日記中這樣記載：「委座決定派徐永昌前往擔任石家莊行營主任，保定命令傳達所所長」，參見錢世澤編，《千鈞重負：錢大鈞將軍民國日記摘要（1）》（臺北：中華出版公司，2015），497，1937 年 7 月 28 日。由此看出，徐永昌似乎去華北的一大任務就是負責傳達蔣介石的命令。

88〈蔣介石要程潛轉令各軍遵照指揮系統下達命令密電稿〉，收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 軍事（2），174。

89《徐永昌日記》，第四冊，1937年9月10日。

airiti

四、結　論

總體而言，徐永昌在華北督戰，其實際職權最有力的時機是1937年7月30日至9月25日這一段時間。徐永昌先有底定方略之功，後有協調人事之勞，亦有監督指揮之權。理論上應該發揮很大作用，然而儘管徐永昌盡力監督指揮，協調人事，他也曾建議節節抵抗，逐次撤退，將主戰場轉移到別的地方以分散日軍兵力，但是華北戰局仍然一發不可收拾。除去客觀物質條件之外，華北戰場可謂當時中國的縮影，在這裡有地方派系、中共、國民政府中央以及親日勢力的角逐，其很大一部分時間消耗在內部協調方面，其權力實施大打折扣。誠如蔣中正曾經感慨的那樣「保定、滄州皆告急，部隊複雜，指揮無方，甚可慮也。」[90]華北初期抗戰失利原因有多方面，諸如中日實力差距，華北地形不利，戰略取捨等等。不過，如果華北初期抗戰有明確指揮系統，上下一心，確定戰略，尚有可為。可惜，恰恰在這些節點上，華北戰局缺乏致勝因素，造成潰敗局面。局部戰局是整體戰局的組成部分，但是對整體戰局也有相當反作用。華北初戰的亂象，直接導致國民政府另闢新的戰場，轉移原定之戰略重心。分析華北初期抗戰失利原因，實際上從某一個層面而言就是探討影響抗戰初期中國備戰、應戰以及失利的深層次因素。

一般而言，我們比較認同時勢造英雄，不過對於關鍵人物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也有研討評價餘地，也就是「英雄」對於時勢進程是能夠起到自己的重要作用的。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徐永昌無疑是一個重要人物，他代替蔣中正督戰華北，是華北與中央政府之間軍情、政情上傳下達的紐帶。他在華北初期抗戰方略底定以

90《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22日。

airiti

及作戰指揮方面，都貢獻自己的力量。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各項法律規章並未能發揮作用，倒是重要人物在這一時期能夠對歷史進程產生影響。利用人物來透視歷史，反思歷史，是我們進行這一時期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徐永昌個人對於華北戰局失利有其應負的責任，然而，考慮到人事關係的錯綜複雜，以及人事關係對政局的作用，通過當事人的視角可以折射出華北戰前以及初戰之時政治生態和人物心態，為理解並審視那段歷史提供更為全面的研究角度。華北「特殊化」對初戰影響至深，地方派系過於注重私利，試圖平衡國家與地方之間利益關係。但是，大敵當前，依然不知一心為國，造成進退失據，一潰千里，我們後來者不能不為之扼腕歎息。蔣中正在大同淪陷前後曾經感歎「晉軍怯弱，冀部複雜，至可慮也。」[91]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抗戰意志是堅決的，但是通過徐永昌的觀感以及行營設立之後發揮的作用來看，抗戰中指揮系統不明確，機構疊床架屋，越級指揮等頑疾已然有所體現。這是一個前現代國家必然存在的弊病，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是一味斥責批判，還是放在大歷史視野下進行同情之理解，是能否客觀評價這一時期歷史的史觀體現。必須看到，雖然國民政府開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但是，由於種種客觀條件限制，這一進程存在種種困難與問題。所謂「抗戰建國」、「抗戰建軍」、「軍令統一」在這個時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91《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18日，「本周反省錄」。

airiti

徵引書目

（一） 檔案

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2. 《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
   (1) 787/7235，〈徐永昌等關於平綏東段及平漢北段作戰情況與軍委會來往電文〉（1937年7月－9月）。

（二） 史料彙編

1.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 作戰經過（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 軍事（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4.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第2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5. 李雲漢主編，《蔣委員長中正抗戰方策手稿彙輯》（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近代中國出版社發行，1992。
6. 周美華編，《國民政府軍事組織史料──軍事委員會（一）》，第一冊，臺北：國史館，1996。
7.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airiti

8.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106輯，《盧溝橋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6。
9. 陳存恭、趙正楷合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10. 錢世澤編，《千鈞重負：錢大鈞將軍民國日記摘要（1）》，臺北：中華出版公司，2015。

（三） 專書

1. 王成斌等主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2.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
3.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4. 趙正楷編述，《徐永昌傳》，臺北：山西文獻社，1989。
5. 趙政民主編，《中原大戰內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6. 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四） 回憶錄

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
2.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臺北：時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7。
3.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2014。

（五） 論文

1. 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5），《文史月刊》2（2003.2），頁60-64。
2. 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6），《文史月刊》3（2003.3），頁54-57。

airiti

3. 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8），《文史月刊》5（2003.5），頁60-63。
4. 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9），《文史月刊》6（2003.6），頁54-58。
5. 賴煒曾，〈從地方到中央：論徐永昌與民國（1927-1949）〉，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airiti

Xu Yongchang And War Situation of Northern China During Initial Time of Sino-Japanese War

Ye, M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initial time of the war, the main battlefield transferred from North China to Shanghai, for North China was losing great relevance. During this period, Xu Yongchang, the director in ShiJiazhuang behalf of ChiangKaishek,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Scholars in the past paye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y and personnel, while ignoring the importance of Xu Yongchang. Making Xu Yongchang as the clue,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And all the facts are precisely the projection of war. Xu Yongchang and the war in North China reflected the ac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Nationalism government in the strategy, internal personnel and preparations for the war. Therefore, the war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can be regarded as a miniatur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efor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XuYongchang, Northern China, Initial Time of War